

红色经典展现天地大美

胡忠伟



书封



梁衡

捧读梁衡先生的《红色经典散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深深被他为文的真诚和大气所感染。在他的笔下，山水自然、天地人杰都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的美。

对梁衡的了解，最初来自小学课本里那篇著名的文章《晋祠》。那时，对作家本人知之不多，只能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读他的文章。文章写得很美，我还摘抄了不少好词佳句呢。

一晃十多年过去，无缘再次拜读梁衡文章。直到1996年这一年，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与同学合伙订了一份《中华读书报》，在某一期《家园》副刊里，我又看到了梁衡的文章《享受人生》。在这篇文章中，梁先生对“享受”一词作了另外的解读：“生命原来是这样的多层次、多角度，生命之花原来是靠这许多的享受供养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全面的享受，它实际是对生命的认识、开发和利用。”

读过之后，却怎么也不能将作者与《晋祠》联系起来。倒是同学对梁先生了解较多，他说，此梁衡即彼梁衡也，他现在是新闻出版署的领导。我就暗地里想，这人的能量真是非同小可，居然能在仕途和为文的两条路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后来，凡是碰到梁衡的文章，我都会抓起来就读。就这样，我一步步走近梁衡，也感受到了他和他文章的魅力，他做人真诚，为文大气，有大美存焉。

梁衡先生主张，为文第一要激动，没有对生活中美 的追寻，没有对自然、人生、社会、艺术中美的事物的大激动、大碰撞、大体验、大思考，就不会有真正的美文产生。因此，文章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文章，这样的文章才能激动他人，洛阳纸贵。

看他写瞿秋白，6年构思，三访纪念馆，却迟迟难以下笔。他对瞿秋白的认识和体悟早已成竹在胸，却难以找到切口。直到找到了“觅渡”这个意象，他才下笔如风，一挥而就，构成佳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思想是自己的，还要找到与天地自然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为文只是蓄势待发，一旦机缘来临，将如火山喷发，其势威矣。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瞿秋白，一介柔弱书生，受命于危难之时，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随即却被自己人一把打倒，他转而 为文。然而天道不公，他还是被叛徒出卖投进监狱，但他始终坚守做人的良知，视死如归，慷慨赴死。“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

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所以，歌颂瞿秋白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就是《觅渡》一文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正是这一点，才让更多的读者记住了这篇美文连同作者的名字。

这样大激动、小切入，大挖掘、大表现的美文在梁衡先生的笔下还有不少。《大有大无周恩来》《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红毛线，蓝毛线》《周恩来让座》《领袖如父》……这些文章无不是从小角度切入，或渐引，或顿入，或宕开，但都开篇大气，往往三言两语就攫住了读者的心，就引人深入，“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李渔《闲情偶寄》）。我想，这就是大情思、大气势、大手笔的结果，梁先生将形、理、情有机地糅合，凝为一体，由景美、情美，达到了哲理之美，产生了一篇篇政治美文。

梁衡先生认为写文章主要有两个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最后作用于读者的或是思想的启发，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当然两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有的便于表现美感，如山水；有的便于表达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欲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

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不断思索，不断创新，既不落他人之窠臼，也不步自己之后尘，使自己的文章有新思想，挖出别人没有表述过的思想，“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他这样一路走来，从山水美文到大情大理，从万里江山到千秋人物，从共产党领袖到普通小人物，从诗词文人到爱国将领，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从从容容。他在诉说，他在描画，为我们留下了如山如海般气势恢弘的美丽画卷，也将一个个人物、景象、情感和哲理定格为一篇篇美文，展示、存放在美丽的人间，让一茬茬读者尽情享受这精神的大餐。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梁衡散文，承继着现代散文精神，以天地大美而立言，写大情、大事、大理，开掘出了一片新的散文天地，达到了一个新的为文高度。



独树一帜的李贽

王兆军



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都是丰富而驳杂的，主旋律与不和谐音同时共存，但当时看来不和谐的音，事后看来也自有其价值。

中国明代的李贽就是一个例子。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明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姚安知府等职。弃官后寄寓黄安、麻城讲学，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或讲学，或刊印书籍，终于被诬下狱，自刎而死。

李贽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反对宋以来的道学，反对思想文化禁锢，提出了很多新理念。他承认个人私欲的天然合理性，“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他认为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且有功绩，抨击重农抑商政策，适应了资本主义

萌芽时期的发展要求。他还对传统封建礼教轻视妇女的观念发起尖锐挑战，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写道：“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短见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晚年颇好史学，根据历代的正史编纂了《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了《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他称赞深受民间喜爱的《西厢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在文学方面提出著名的“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坦率地抒发己见，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陋习，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既益国也利民的治世方略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由此可见，李贽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政治诉求还是要一个贤明的君主，而非其他。

李贽在思想上的丰富性和独创性给后人提供了一面镜子，那就是：不能轻易否定“异端”，思想的原野上，只有鲜花盛开草木葳蕤才能形成清新的空气，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精神要求，才能造就健康美好的生活。

伦理学不是修身学

廖娟

小偷人人喊打，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有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比如弟弟为了给哥哥交大学学费而偷钱，哥哥却为了减轻弟弟的罪责，帮助警察把弟弟送进监狱——这是《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报道过的真实案例。何怀宏在《伦理学是什么》里，便用这个发人深省的案例，将读者引入伦理学的魔方中。

何怀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人人知道哲学是动脑子的事，所以有“哲思”一词；而说到伦理学，大多人便觉得是“君臣父子”那套压人的教条，令人反感。可实际上，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的不是行为准则，而是思考方式，与修身学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民国教育家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途；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

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写于1937年，为中国伦理学的开山之作，而那时中国伦理学尚未受西方

影响。蔡先生将中国伦理学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明理学三个时代，论及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等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然，古代尚无专门的“伦理学家”一说，蔡先生只是挑出这些思想家著作中涉及伦理的部分择而述之。而这些思想家的学说，涉及政治、军事、教育、美学诸多方面，所以蔡先生说，伦理学是“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矣”。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但是它不会要求你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只会告诉你怎么去思考。

何怀宏举了一个海难时的道德选择案例说明这个问题。按照生存可能性原则，就要保留最具生命力的人，放弃老弱病残（《少年派》的原型理查德·帕克因此被另外三名成年船员杀掉）；按照自我优先原则，首先就要考虑自己，这就不会有自我牺牲；按照最大功利或快乐原则，则要选择那些会对未来社会贡献最大的成功人士，舍弃贫

弱；按照德性原则，就要救好人舍坏人；还有一种妇女儿童优先的人道主义原则，泰坦尼克号就是那么做的。

所以伦理学其实是让人学会理性思考人生中的道德选择，尤其是当道德与法律、经济、宗教等发生冲突时，它可以让你冷静下来，理清思路，从而做出恰当的选择。

何怀宏认为，当今社会丢失了传统的伦理精神，对美德、尊严和高雅风格不但不再尊崇，反而采取各种戏谑态度。想想网络上流行的各种粗俗语言和惊人之语，似乎确实如此。

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思考方式，伦理学的眼光也更广、更深。现代伦理学不仅包括生态伦理（研究人与自然、与动物的伦理关系），还有一个新的关注点是全球伦理，它传达的是一种人类互相依存的和平信念。

何怀宏相信，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为此努力。



永远的北京胡同

张晓辉

如果你想了解北京胡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当代历史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它又融汇了怎样的人情和世故，不妨就读一读麦琪写的《北京胡同女孩》（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麦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对于北京胡同的认识虽不及父辈那般全面与深刻，却也了然于心。她说：“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以及对舶来文化抵抗的顽固情绪，给人的感觉不仅古老，而且神秘和沉重，或者说不太轻盈。这种不很轻盈的感觉，浸透在深红色的宫墙和灰色的胡同里，浸透在清晨遛鸟的老人手里提着的摇来晃去的黑布罩着的鸟笼里，浸透在夏夜昏黄的路灯下打扑克的人们叫真儿的喊声里，浸透在春节各家各户串门拜年的喜气洋洋里。那种感觉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又那么明显地存在着。”而胡同作为北京城“灰色”的一面，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在胡同里，“听着老年人管火柴叫取灯儿，管太阳叫老爷儿，管收音机叫话匣子，觉得好笑得很了。”

然而这“灰色”的胡同，却也有它明媚的一面，或者说辉煌的所在，不信，“老北京随便带着你在胡同里走走，就可以指点出一些史迹来，袁世凯住过的锡拉胡同，康有为住过的米市胡同，北平截胡同41号那是谭嗣同的故居，棉花胡同66号曾经住过蔡锷将军。”还有鲁迅呢，胡适呢，徐志摩和林徽因呢，他们也不在北京胡同住过么。看来，胡同之于北京大有长城之于中国，一说北京，哪

能不提胡同呢。

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共和国成立后，以至后来的改革开放，胡同也像是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似的，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与胡同有过纠葛的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多代人，又怎能忘记胡同带给他们的那些留在记忆里的喜悦与忧伤呢。

为了缅怀过去，给后人留下纪念，同时也是向日渐式微（只有少数辟为纪念馆）的北京胡同致敬，作者创作了这部小说。

在小说中她写道：“胡同人的忘性很小。那是一个很紧密的小社会，他们对周围事件的记忆常常让人有一种幻觉，好像日子原来不会挪动的，只是因为他们的同意，日子才勉强地往前走一下，否则的话，日子会像站桩的师傅一样，一动不动。”让人感到胡同是那样的凝滞，有点像死水，然而，它有多深，又猜不透，它是一个小江湖，有自己的一套运行规则：“茶壶嘴不能冲着人；饭不能盛得顶到鼻子尖，别把人家当饿死鬼了；客人要走得留人家几次，哪里有人家说走你就站起来送客的；凡事话必须得说到，让人家挑不出礼来……”这可不是胡同里长辈人告诫下辈人的，尤其是丈母娘对姑爷（也就是女婿），真

是让人觉得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还有：“那是60年代，交朋友是要有介绍人的，没有介绍人就有了约会，就像没有结婚就有了男女关系一样的大逆不道，父母迁怒于那个小伙子，无论他如何解释，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了。她拼命反抗过，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不吃饭，但是父母没有妥协，最终妥协的是她，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父母即使看到她死也不会顺从她的。”这就是那时世俗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是“有意思”了。

因此，胡同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命方式。

小说叙述了5个来自北京豆元胡同的女孩1988年到2002年各自命运的变迁，并记录了她们与胡同千丝万缕的联系，再现了一种古老朴素生活的消失以及蕴藏其中的深层的真实和悲哀。

胡同作为一个象征，一个巨变时的新旧交替的象征，有它特别人间烟火的一面，更有各种思想的交织与碰撞，从中可以看出它的宽容与狭隘，繁琐和单纯以及荣耀与衰微。

胡同，终究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商务印书馆“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又推新书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为武器的图书》《莫斯科的黄金时代》引起各方重视。至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已出到20本。《作为武器的图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为读者展示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出版人合作，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图书的计划。此时，图书被赋予对纳粹和军国主义“毒害”的人们进行“解毒”的使命，也被出版业和政府关键人物视为“一切宣传工具中最为持久的一种”，成为战争期间及战后有效的“思想战争的武器”。《莫斯科的黄金时代》则呈现了二战后苏联如何致力于在全球打造苏联文化品牌以及苏联文化所暴露出的弱点。本丛书的开山之作是法国学者马特尔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呈现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文化战争的画卷，他的另一部力作《论美国的文化》则通过对美国文化运行机制的研究，揭示了美国文化能够广泛传播的缘由。

该丛书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人类历史进程中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文化发展的重要著作，详尽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文化战略与战术，为中国文化发展及国际传播寻找路径，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近日，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了“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方向与路径暨‘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出版研讨会。（小章）

《中国：确保实现百年目标——“十三五”规划》日文版面世

中国两会召开之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最新著作《中国：确保实现百年目标——“十三五”规划》日文版，由日本侨报出版社隆重推出。3月17日，胡鞍钢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就该书发表专题演讲，向日本各大媒体的70多位相关人士详细解读了“十三五”规划，得到很高评价。著名媒体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突出报道，亚马逊一周内发出3次订单。



胡鞍钢指出：“2016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中国将大展宏图。”

2014年，胡鞍钢教授所著《中国：创新绿色发展》日译版由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各方好评。（段跃中）